

文庫博物館專集（六）

(CND-CM)

—— 增刊 第八十六期 ——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九日出版)

1.【文献资料】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聂元梓等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在庆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李敦白
2.【往事追忆】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	赵淮海
记一次“红八月”打人	赵淮海
文革琐忆	杨林

【文献资料】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编者的话】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大餐厅的东墙贴出了质问校领导的大字报。几天后，它被毛泽东誉为“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书”，并指示在六月一日晚上向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还同时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从此，文化革命从报刊上的批判声讨转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学校也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停课闹革命”。在后来八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又称赞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纪念这一系列文革初期重大事件的三十周年，我们在这一期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及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全文。另外，我们也刊登李敦白在“庆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读者可以在这篇发言中了解文革中人们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和流行的文风。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生文革前为中

央广播事业局外国专家，在文革后期以美国间谍罪入狱，“四人帮”垮台后获释，现已回美国定居，著有回忆录《掉队的人》（The Man Left Behind）等书。

∞ ∞ ∞ ∞ ∞ ∞ ∞ ∞ ∞ ∞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

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矛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 ∞ ∞ ∞ ∞ ∞ ∞ ∞ ∞ ∞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 人民日报评论员 •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

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佩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分，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 ∞ ∞ ∞ ∞ ∞ ∞ ∞ ∞ ∞ ∞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 毛泽东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

发人深醒的吗？

∞ ∞ ∞ ∞ ∞ ∞ ∞ ∞ ∞ ∞ ∞
在庆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 李敦白 •

同志们，战友们：

让我们首先祝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救星，世界人民的伟大旗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同志们，过去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有一个很长时间向往着克里姆林宫，看着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五角星。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取得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福音，就可以获得解放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体革命人民夺了权，但是那个权又被资产阶级，又被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夺回去了。莫斯科上空的红灯熄灭了。现在我们心中一个最迫切的要求，一个最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的革命造反派群众，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中国的革命红卫兵是绝对不会允许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在中国这块世界革命的基地复辟。毛主席像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我们相信，永远不会允许任何人拿下来。别了司徒雷登，已经十八年了。但是司徒雷登的阴魂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算彻底地从北京大学的校园上驱散了，驱走了。驱散了司徒雷登的阴魂，就给全世界受美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人民做出贡献，我们感谢你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美帝国主义从压迫美国劳动人民，首先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二千二百万黑人出发，发展到压迫全世界各地人民，它是企图征服全世界，永远奴役越南人民，在它的全球侵略计划中最主要的一篇就是要征服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中国。但是中国人民找到了自己天才的领袖毛主席，锻炼了自己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赶走了帝国主义。但是美帝国主义能就此罢休么？它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它从来没有放弃在中国复辟反动统治的侵略野心。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人民的队伍中，有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有它的代理人，有替他服务效劳的人。首先美帝国主义把它的希望寄托在象你们过去在北京大学的那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一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身上，企图用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专政，企图通过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制度抵制毛泽东思想，替它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做舆论准备。但是露骨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倒台了，它就转而依靠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继承者——陆平黑帮。你们把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把帝国主义最后一线希望搞掉了，这又做出了一次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又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生命力。到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出来了，刘少奇、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就出来了。他们提出“三和一少”配合修正主义；他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养”，来束缚革命派的手脚，企图把革命打下去，企图把革命派和他们的革命行动搞臭。你们的光荣的聂元梓同志和其他同志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的阴谋，和其他兄弟单位一起，把他揪出来了。因此又对世界革命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贡献。美帝国主义就绝了路。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打倒，还没有被拉下来斗倒斗臭，尤其是他的思想基础，他的修正主义的“修身”论——“修养”论还没有被彻底批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我们认为，就是又一次伟大的进军号角。我们相信在彻底粉碎、彻底战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次决战中，新北大的革命同志一定会又一次做出新的伟大贡献，决不会落后于别人。美帝国主义的另外一着就是企图用武装威胁和武器侵略征服中国人民，破坏中国人民革命和世界革命。在越南已经节节败退的美帝国主义现在发急了，它决心今年要动员几十万远征军，把战火扩大到印度支那，甚至想把战火扩大到人民中国。但是，经过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等待

着任何侵略者，美帝国主义也好，它的头号帮凶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也好，所有的敌人一起来也好，等待着他们的不但有强大无比的解放军，强大的民兵队伍，还有千百万的无产阶级左派为核心的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这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大军，还有英雄的红卫兵，帝国主义胆敢动革命中国的一根汗毛，就会被碰得头破血流，打得粉身碎骨。

同志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继续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乘胜前进，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决战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世界人民解放的伟大福音、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世界革命的棋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敦白同志是美籍中共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负责人之一。）

□ 原载《新北大》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

【往事追忆】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

• 赵淮海 •

## 1 • 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

我小时候因为好看闲书，经常从家长买菜的提兜里偷得几分钱，放学后到城根儿底下的小人书铺坐上几个钟头，结果功课老不长进，后来只考上了一所二流中学。

一天吃晚饭时听家长聊天，说有个中学生反映初中语文课本里《牛郎织女》一文说牛郎偷看女人洗澡，并用偷衣服的办法迫使织女嫁给他是流氓行为。古文《爱莲说》宣扬士大夫清高。果然，第二年的语文课本里删去了这两篇文章。

我上中学以后，开始对数学感兴趣。不知怎的，和班上同学弄成这样一种习惯，在自习课上，谁先解出一道题，就马上喊出答数，以炫耀自己解题快捷。别的解题快手一听到答案，立刻放下自己手中尚未解完的同一道题，而转入解下一道题，以便也能抢个先手。这当然违反课堂纪律，不时遭到班干部的呵斥。当班干部的多把精力放在打小报告以邀宠上，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自习课上喊答数频率最高的集中在我们五、六个人。这些人也比较要好，想方设法地玩，有点精力过剩。学生对教自然科学课的老师多好感，特别是我们这些男生。我们对老师的评价是：第一要有学问，不致当堂被学生的问题窘住，第二要随和，不充老大，第三要年轻漂亮，特别是女老师。

我最恨的是政治课。我们那位政治老师是个年近三十岁还找不到对象的男老师。他上课时总板着面孔以示严肃，对课堂纪律要求极其苛刻。他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政治大名词，大概只有班干部才听得懂。平时他总是把头发梳得油亮，但衣服却是又脏又破以示艰苦朴素。一天上课时，他那条又脏又旧的皮带扣上以后，忘了把

皮带末端插进另一侧的裤腰里去，吊在两腿中间，随着他的抑扬顿挫晃来晃去。我旁边位子上一个“坏小子”悄悄对我说：“你瞧，咱们X老师的皮带多象条驴鸡巴呀！”我听了赶忙捂住嘴，怕笑出声来。

语文课里如《牛郎织女》和《爱莲说》都已删去。代之多是阶级教育和英雄模范事迹，已经与政治课无异，也无甚文采，故我也不喜欢语文课。其实这种不喜欢并不妨碍我广泛涉猎文学名著。

## 2 • 批判《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

文革开始时，虽然我已经知道不少海瑞的故事，但对于批判《海瑞罢官》代表了什么官方讯号，实在一无所知。并且觉得清官总比贪官、昏官好罢。后来政治老师说：清官、贪官都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一样的坏。且清官对这种维护起的作用更大、更有效，所以更坏。此话似乎有理，姑妄听之。

紧跟着批判《燕山夜话》。我当时很喜欢读《北京晚报》上连载的《燕山夜话》，而那些批判文章却看不大懂。直到报上发了个蒙古名字的作者写的批判文章，说《燕山夜话》里的科普小品《金龟子里有黄金》是在为赫鲁晓夫说好话，因为赫鲁晓夫这个字在俄文里是“五月金龟子”的意思。虽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当时我还是不得不佩服邓拓的知识广博和那蒙古人破解能力之强。

## 3 • 最后一课

忽然一天，上午第二节课的铃声响过了，我看见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走进教室。那位最受同学爱戴的几何女老师走到讲台上，和平常一样满面笑容地和学生商量，这节课还上不上？学生们听说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上课，都象笼中鸟看到那笼门打开了一样，乐得自在，当然一齐大叫“不上喽——！”。想不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我打听了一下，原来前两天报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中央向北大派了工作组。现在这股风传到中学来了。其实我已经从报上看到了这些消息。不过这与我何干，谁去琢磨它呀！

大约就在这几天传来了毛主席指示(那时还不叫最高指示)：“老师不要把学生当敌人对待。学生上课可以不听讲，可以不交作业，可以睡觉。”我听了真佩服他老人家的洞察力。将来如果真的教育革命了，我就不选这样的政治课和语文课。政治老师就是把学生当敌人对待。班主任玩弄权术以控制学生。班干部都是老师的狗腿子。

不知出自什么原因，老师曾有几次扶持我当班干部。但我对监管同学没有热情，除了收作业，喊口令外，其他一概不管，还和调皮的学生一起淘气，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所以每次都是还未到任期满就被解职，以至成了班上的“民主人士”。

每次选班干部。老师都把我们这些中游基本群众召集到一起，内定候选人。第二天这些人的投票全和老师的意图一样。所以每届班干部都是那几个“勤于向老师反映情况，勇于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人。我总觉得，除了这口号说词的不同外，他们和革命回忆录里的工贼无甚两样。后来我才发现，他们都有本事逃避下乡，并很快地入党提干。如今的“第三梯队”大约又是他们组成的吧。

中国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在每个班上分出管人的班长、少先队中队长、

大队长到中学的团支书、校团委委员，再到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直到社会上都是由他们负责监管别人。这种人就是所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些干部苗子练的都是童子功，以至于他们已经不会想象不管制别人是一种什么滋味。

文革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某个从小一贯表现好的干部苗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某大知识分子成堆的大机关工作，却大发牢骚，抱怨领导不重视他。其实他在那里不过是个芥菜籽大的人物。

那时还有的大学里发现学生党支部书记偷东西。其实这并不奇怪。那种政治工作就是把人训练成不以盗窃为耻，却以不受领导重视，不能监管别人为耻。

而占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从小就处于一种受到班主任、家长和班干部联合编织的监视网里，动辄得咎。我从来也不曾嫉妒过这些争宠拔尖的班干部，因为我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所痛恨的是他们恃宠而骄，仗势欺人，并经常以到老师那里出卖我来作为他们自己邀宠的本钱。所以我对自认为是旨在去除这种班干部制度的教育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大革命，是打心眼里赞成的。

#### 4 • 工作组

停课的那天全校沸腾，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下午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别的大学向中央要求派工作组，有的中学也向团中央要求派工作组了。我们学校一个据说可以上课不用讲稿而能滔滔不绝于口的高中政治老师听说以后，也带头跑去团中央。

果然，第二天下午工作组来了。我站在夹道欢迎的人群外边，见到几个土头土脑的青年男女，背着很脏的行李走进学校。第二天才知道他们都是刚从四清工作队调回来的。

工作组进校不久，开始批斗党支部书记。我们学校的党支书是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嫁了个更高的大干部。现在想起来她不过平时穿着比较整洁。人家到底是大家子出身，不那么小家子气。

忽然一天，听到学校大喇叭高喊，要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到操场上集合。我们也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出身，大家都到操场上看热闹。原来是几个高中生正在慷慨激昂地指责工作组。当时我们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他们中有人是“大院”里的高干子弟，消息灵通，听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事，也学着干了起来。

这两个附中还算创举。我们学校的人不过跟着瞎起哄罢了。总之工作组撤走了，灰溜溜的。那个上课不用讲稿的政治课老师又表态“坚决支持”这些过去挨他教训的学生了。

后来工作组又回来作检查，再后来见到他们也都戴上了红袖章，再后来听说他们有的又挨整了，有的还自杀了。总之，当过工作组的人很多下场很惨。他们多有积极向上的热情，只因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次既然是“资反”路线，那么响应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参加造反派就是正确无误的选择了。这当然是正常正确的逻辑推理。只是在中国只讲辩证法，从来不讲逻辑。等那“三支两军”的大兵一到，由不得申辩，他们又都成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分子”，弄得他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大概自杀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 5 • 当上红卫兵



我那时对清华附中首创红卫兵还是佩服的，却对“红卫兵”这个名字不以为然。这名字很象“党卫军”，而且既然是造反，何以还要用个保卫的“卫”字。保卫即保守，还怎么造反？后来我看到它校红卫兵写在墙上的“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时，马上联想到一个能胜过他们的标语：“红色法西斯万岁！”

工作组走后，学校里的高中生成立了两个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一个是以学生干部里的红五类子弟为主。另一个则以比较调皮的红五类子弟为主。全校四个学生党员中有三个在第一个红卫兵里。一个是第二个红卫兵的头儿。其实他们过去一直受旧校领导的恩宠，也不知道造的什么反，诉的什么苦。反正他们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人，当然，眼下什么时髦就追什么。

我回家问自己的家长，我算什么出身。家长驳斥我说：“问这个干什么？！你有再好的出身，自己不努力，还不是一事无成！”

我说学校里组织红卫兵，让大家报出身呢。家长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说：“那你就算职员吧。我们都是国家职员。”

第二天我就报了个职员出身，不料另一个同学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党员”。我说“好象是。”他说：“那该算是革命干部”。从此我才知道自己是“干部子弟”。而同时发现过去班上那几个解题快手除了我以外，都有家庭历史问题。

我在红卫兵登记表上开玩笑，出身写成“革命职员”，父名写成“赵谋仁”（赵某人），母名写成“牟适”（某氏）。记得那些忆苦思甜报告总是说：“你们都是在蜜水里泡大的，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好好的日子过着，成天在蜜水里泡着，造反不过是说说玩而已，哪能当真呢！

因为我一贯不愿意受班干部的鸟气，所以选择参加了第二个红卫兵和他们做对，心里颇有点幸灾乐祸劲头。特别是见到平时又怕又恨的政治老师和班干部翻过脸来向我们低三下四时，那心理状态和阿Q扛回了一包省城里的东西而遭遇到平时作尽威福的乡绅们尊敬时一模一样。

同学中只除了班干部向我们低声下气之外，别的同学，特别是过去的朋友仍然平等相待，照常一起出去郊游，不以政见坏交情。

## 6 • 第一个“破四旧”场面

我对“破四旧”毫无思想准备。小时因为没能考上寄宿学校以摆脱家庭的监督而倍感遗憾。红卫兵一成立，占据了一座教员休息楼，里面有几张床。我白天玩得太晚了，懒得回家，就找张空床睡一宿。

有一天半晚十二点左右，忽然一个守电话的高中红卫兵把我们叫醒，说“有情况”，要大家起床整队，准备出发。我被大家弄醒，睡眼惺忪，嘴里咕嘟着牢骚话，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街上很静，已无公共汽车，我们步行了总有四五站地，在一个胡同口见一中年妇女向我们打招呼，然后把我们领进那条胡同，拐了几个弯，走到一个小四合院门口。我们就排着队进去了。

在门洞了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穿白制服的警察站在黑暗里。那几个妇女显然是街道积极分子，警察当然就是负责这个管片的户籍警。我心里老大不高兴，却原

来你们街道和警察做眼线，让我们红卫兵打头阵，你们都藏在后边。我似乎已经意识到，我们是被人当枪使了。可是人已经到此，也不能不进去。

我们往里走时，见一群另一个学校的红卫兵正在往外搬东西。原来已经有人在抄了。那被抄的人家住在小四合院的东北角。抄他们家的原因是因为那家的老太太是教徒。

我们走进屋里，见那老太太头发已白，毫无反抗地站在屋中间，还说着平时招待客人的客气话：“来了，请进，坐一会儿罢。”一点没有阶级斗争的气氛，弄得我也象到生人家里做客似的很不好意思。

我们从老太太屋里鱼贯而过。这间小屋子只有九平方米大小，看得出来，平时收拾得很干净。唯一与众不同之处是靠东墙放着一架立式钢琴。

在我前边走的一个红卫兵拿起桌子上的一个多棱玻璃球问我：“这是什么东西？”似乎想抄走。我拿过来看了看，告诉他：“这是镇纸用的，玻璃的”。说完又将它放回原处，然后走了出来。

从院子里出来再次走进门洞时，黑暗中一个居委会的女人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小声说：“那西屋里还有一个圣象呢！”

我无法，在此地也退不得，只好硬着头皮转回身去。这时那教徒老太太已跟在我们后边走出来相送。我拦住她，折下腰来，学着电影里解放军对待房东老太太的样子问：“老大娘，是您的西屋里还有个圣象吗？”

老人慈祥地说：“是的，是有一个，不过那西屋门锁着呢。”

我不愿意逼这么善良的老太太交出钥匙，虽然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可这时那居委会的女人已悄悄走到我身后，用手指捅我的腰眼。我明白她是要我去追逼那西屋的钥匙。

我心里极没好气，又不便立刻走开。于是我问那老太太：“老大娘，您是信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天主教。”

“那么说，西屋里的圣像是圣母玛利娅像，不是耶稣被难像了？”

“是的，是圣玛利娅。”

其实我一个文革前的初中生，对宗教的全部知识仅此一点而已，却在这么个场合用上了。我不想再打搅这位老大娘，又嫌那居委会的女人讨厌，于是向那老太太说：“大娘，没您事了，您回去吧。”

老大娘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转身回屋了。

我看着她进了屋，才走出那院子。我猜，我这最后一个走出来的红卫兵不去追那圣象，居委会的人大概也不会去追。她们才不肯当面得罪她们的邻居呢。这个圣象说不定就算留下了。

我站在门口想这位老太太对那圣象的态度与我们这些抄家的红卫兵对待伟大领袖

袖毛主席像的态度似乎有某种相似。可我不能说出来。这时我听见身后一个先来的那个学校的小女孩在和旁人小声说话：“呦！他还知道什么玛利娅，天主呢！”

我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心里说：“就凭你们这点水平，也配出来抄家。”

被抄的东西装在一辆卡车上，到底抄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只见先来的那个学校的红卫兵正在往车上爬。我们步行了半天很累，也想搭这辆车回去，可是被我们学校的领队拦住了。他向已在车上坐好的那个学校的红卫兵说：“把你们抄的存款交给我们，由我们去上交”。

只见一个穿旧军装的小男孩把背着一个军用挎包紧紧地抱在怀里说：“不行，这是我们抄的，我们去交。”

双方争执了一会儿，那小男孩说：“这存款不能交给你们，谁知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而且你们立场不坚定，把阶级敌人叫老大娘。”

这话显然是指我。我一下气得火冒三丈，刚想上前和他们论理，骂他们狗屁不通。却被我们的领队拦住了。他说：“好！这存款和这车上的东西全是你们抄的，你们去上交。我们没抄任何东西，也没插手，所以我们也不负任何责任，全由你们负责。”

那小男孩显然是他们的领队，不屑地说：“谁要你们负责了？！别想抢摘胜利果实。”说完，就命令汽车开走了。我们学校的人一个也没上去。

大家正要往回走，不料那几个居委会的人又拦住我们说，那边还有一家，于是领我们又拐进了别的胡同。

## 7 • 第二个抄家场面

弄不清拐了几条胡同，也进了一个四合院。那院门开在东南角。这时我发现也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外的阴影里。领我们来的居委会的女人和他咕嘈了几句，就让我们进去了。却原来这里也已经有人在抄了。

我们走进此屋，只见两个穿着比较时髦的小伙子低头站在一边。原来这家人是个航模爱好者。衣柜上，桌子上，墙上摆放着好多大大小小的飞机模型。其中最大的一架差不多有一米长，草绿色的胶纸蒙皮，里面是木制骨架。显然费工不少。前头装了一台小发动机，驱动一付铝制螺旋桨。这个制作者显然是个内行。只见一个先来的那个学校的红卫兵一边骂，一边把那架最大的飞机扔到地上，然后猛然踏上去。

看着这情景，我本能地要叫出来，可想起刚才落了个“立场不坚定”。只好把这一喊变作了一口倒吸气。只见那红卫兵连踩了好几脚，一架不知费了多少工夫精工制作的航模碎烂的无法收拾了。

我在屋里转了转，见窗台上放着个小盒子，上面写着“乙醚发动机”。我拿起来打开一看，是另一台尚未用过的小发动机，很精巧。我掂了掂又把它放回原处。这一晚总算没白跑，知道了这种发动机原来是用乙醚作燃料。

按说一个航模爱好者不属于阶级敌人，本不该抄。而除了这些航模外也无甚可抄。那几个先来的红卫兵肆意毁了一通以后，突然其中一人大叫：“你说，你为什么用黑框装毛主席像，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听见叫声，过去一看，原来正对门的堂屋北墙上挂了一个在当时所能买到的最大号的毛主席像，装在一个质量相当好的镜框里。那镜框的木头是紫檀的，故是黑紫色。我在故宫见过紫檀家具，所以知道。本想代那被抄的人解释一下，又怕再落个“立场不坚定的”，就没张嘴。

我问一个先来的红卫兵都抄了些什么？他说抄的东西都在警察那里。我走出院门，向那警察要来抄的东西一看，原来是一付拳套和一把精良的匕首。我把他们还给警察，并问这家是什么成分。警察说是“流氓”。

那时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只有流氓才玩拳。可我又很奇怪，既然是流氓、坏蛋，怎么家里有那么精致的毛主席像呢？老实说，直到八三四一部队首倡的“早请示，晚汇报”之前，我们家都没有一张毛主席像。我也稀里糊涂，便找到屋里我们学校的领队悄悄地跟他说：“走罢，没什么意思。”

他点点头，在我耳边小声说：“你先溜回去。我再通知咱们学校的人一个一个悄悄走。”

我明白他的意思，一个人溜了出来。不料刚走过那警察，他身后那几个街道积极分子又走出来拦住我说：“你怎么不抄了？快回去抄呀！”

我急中生智，马上问道：“公共厕所在哪里？”

她们领我拐了个弯指给我看厕所的位置。我还真有点憋得慌，进去撒了泡尿，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朝另一个方向拐过去，赶紧溜回学校了。

等我躺到床上后，别的红卫兵才一个个陆续回来。最后一个领队。大家把外衣脱下来往床上一摔，骂道：“真他妈没劲！”

## 8 • 老红卫兵倒台

从此之后，不管别人怎样动员，我也不再参加抄家活动了。紧跟着毛主席连续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然后是大串联，回来以后我们这批老红卫兵又成了和当初反对的工作组同样的罪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想起当初“破四旧”干的事，真是缺德。可是见到前不久还向我们低声下气的同学，翻过脸来组织对我们的批判也真恶心。其实我们并无对同班同学的劣迹，而他们却并不留情。倒是那些过去要好的，真正出身有问题的同学，虽然疏远了，但并不热衷于整我们。还是过去一贯当班干部的那些人最下得了手。他们由于没有红五类出身，而在从小得宠的青云路上有两三个月不能春风得意，好象非要加倍报复回来似的。幸亏我们到底有出身这块牌子保护，军训团才没让狠整。

我们学校那个上课不用讲稿的政治课老师又拉了一派造反。几个月工夫，他已经是第四次改变政治立场了。

再后来，我也成了“黑帮子弟”。我家也数度被抄。在抄我们家的父母机关同事中，从未感到丝毫象我抄别人家时的那种不忍和退缩之情。大人比孩子更丧天良。这时我才意识到根本就不是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是地地道道的“身在祸中不知祸”。

临下乡前，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家里来饯行，却被街道积极分子叫来警察把我们

都抓去派出所，还得等挨了一天批斗的家长回家后再去领人。抓我们的罪名就是“流氓”。证据就是那几个空啤酒瓶。

## 9 • 学生仍旧是敌人

经过天老地荒的插队，我才在恢复高考以后上了大学。距离文革爆发时的最后一课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了。到大学里一看，老师还照旧拿学生当敌人对待。系里管政治思想的干部定期用扣政治大帽子的办法训学生。班干部依旧玩弄权术上拍下压。

我们班唯一的党员在事隔十年之后，还在吹嘘自己当年是如何靠拢军训团而成功地逃避了上山下乡。然后他让同学写入党申请书。凡写了入党申请书的就成了一伙，几个人轮流当班干部，直到毕业分配。最好的名额都被他们私分了事。

当年我最欣赏的毛主席指示，“老师不要把学生当敌人对待。学生上课可以不听讲，可以不交作业，可以睡觉”，竟然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贯彻。我因为上课睡觉而受到系里训斥时，就以毛主席这个指示质问系领导。可他们没人肯正面回答。

## 10 • 谁是教唆犯？

我作为一个“破四旧”的参与者，虽然经历了两个抄家场面，但未拿群众一针一线。老红卫兵倒了以后，再也未参加任何组织。既没打过人，也没整过人。所以我有胆量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

如果没有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我是有正常是非辨别能力的。我在抄家活动中当了逃兵，可是没有站出来制止，但这不能算没有勇气，因为我的正常是非辨别能力都被我的伟大领袖、党的报纸和老师们的给弄糊涂了。

中国的法律中有个“教唆犯罪”，是指教导别人如何犯罪者的罪行。“破四旧”那样大规模的侵犯公民利益，当然是犯罪。但能让我们这些尚不足法定成人年龄的孩子负什么责任呢？！

应当为此负责的首先是亲笔写下“破四旧”指示给彭小蒙的毛泽东。如无此信，断无“破四旧”之举。再有就是所有的政治课老师和一部分语文课老师，以及所有为虎作伥的学生干部。尤其是每个学校都有那么几个特别嚣张的校团委委员和学生党员。不是他们多年的蛊惑，小小的孩子不会那么易于鼓动。

“破四旧”最直接的教唆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人民警察和街道居民委员会。任何人都可以想象，那些从未进入过社会的孩子怎么可能知道谁家该抄，谁家不该抄。如果没有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系统指导，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是不可能的。

我们那次行动就是被居委会的电话招去的。事后我问过许多别处抄家的红卫兵，他们全都证实了这种指导。然而这不名誉却要由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背着，永远背着，承受着千古骂名。

## 11 • 缘尽文革

其实中学文革的各派之争，并不是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之争。说到底，是干部苗子和干部苗子之争。文革前争宠拔尖的班干部和团干部内部，红五类出身的干

部苗子因为在文革开始后有先天优势可恃，而把仗势欺人的矛头对准了他们的同类，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干部苗子。后来批斗老红卫兵时，自然是这些也曾争宠拔尖的非干部子弟的干部苗子最有报复激情。

我虽然也是干部子弟，却从来不是干部苗子。所以在我看来，老红卫兵也罢，造反派也罢，四三派也罢，四四派也罢，凡热衷派系争权与批斗者都同样不是好东西。

我下乡以后每次回家探亲都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深夜的户口检查，并撵我离京。久而久之，我渐渐明白，这天下，这党，再也与我这样的干部子弟无缘了。

我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文革前因为反感于老师和班干部、团干部的整斥，从来也没写过入团申请书。后来也从不曾入过团。文革结束后又因为出身好而被动员写入党申请书时，我反而以不曾入团者没资格入党为理由，貌似谦虚地搪塞了过去。

直到今天，我所参加过的最后一个政治组织仍然还是当年的老红卫兵。

□ 原载《中国之春》第29期，1985年11月号。

∞ ∞ ∞ ∞ ∞ ∞ ∞ ∞ ∞ ∞

### 记一次“红八月”打人

• 赵淮海 •

红八月破四旧时虽然我本人没打过人，却在一旁看过热闹。

有一天，我和另一个班的红卫兵闲坐胡聊。他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带着儿子走了进来。这位父亲是个老工人。他儿子是班上有名的淘学生，不好好念书，也不守纪律。老工人望子成龙，一心指望儿子有出息，文革前就一直以爱找老师严管儿子闻名。可是儿子就是不听话。他把儿子交给红卫兵说：“我儿子太不成气，你们红卫兵都是好样的，帮我管教管教他。”说罢留下儿子，自己上班去了。

这几个红卫兵先还是一通革命大道理，只见这位同学两眼发直，满头雾水，怎么也听不进去。于是这几个红卫兵生起气来，命令他站到桌子前面，两手撑着桌子，撅起屁股，然后抡起皮带一通狠抽。这个人以前打过群架，熬得住疼，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打完了，这几个红卫兵说声：“行了，回家去吧。”就把他给放走了。

第二天，那个老工人忽然又来了。我们本以为他是来感谢红卫兵对他儿子触及皮肉的教育呢。不料那老工人一开口就是满腔怒火：“你们打了我儿子。他回家后两眼发直，一声不吭。我和他妈赶紧送他上医院。医生说是神经受了刺激。就是让你们打疯了。你们说怎么办吧？”这几个红卫兵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个局外人赶紧打圆场：“大叔，对不起，打人不对。我替他们给您道歉了。虽然我没打，但我也没劝阻，我也有责任。”

那老工人先还不依不饶。但后来看看也没办法。找班主任校领导吧，他们都被打倒，进牛棚当劳改队去了。找法院公安局吧，哪有个法院公安局管这等闲事。他老人家生了一通气，悻悻地走了。

等他走后，他儿子班上的红卫兵才没好气地说：“你把儿子送来管教，管教完了，你又不干了。”

那个儿子并没有疯。数年后我见到他已经继承乃父的事业当了工人。虽然没有成龙，但总比我们强多了。我们那时还困守在乡下当插青进不了城呢。

老红卫兵倒台以后，我们也知道抄家打人不对。虽然我没迫害过同学，没打过人；但在一边袖手旁观不加劝阻，现在想起来也够孙子的。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仍愿意向红八月破四旧时受到财产损失和无辜受害的人们再一次表示歉意。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

∞ ∞ ∞ ∞ ∞ ∞ ∞ ∞ ∞ ∞

文革琐忆  
• 杨 林 •

这事发生在赣东北农村。

因为我比别的男孩文静，不到五岁就被送进了我们家隔壁的小学。记得当时其它学校的学生来见老师时，戴着红领巾，先敬一个礼，我很羡慕。第二年文革开始，这种礼节渐渐地不见了。依稀还记得工作组、十六条什么的。不知为什么，对《毛主席语录》第一版某一段一直记得很清楚：“刘少奇同志说得好：“有些人的手伸得特别长，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对文革有真正记忆的事开始于写在学校墙上的大字标语：“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打倒刘、邓、陶”。

频繁的批斗会

刘少奇被定了性以后，每个村口都有他的泥塑像，塑像上挂着写有“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牌子。家中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四类份子经常被斗，成份较高的人如上中农也岌岌可危。我以为这些人真的很坏，恨不得“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得有一次闯进地主茅棚（他们早已被赶出房子而被迫住在村后山坡上的茅棚里）打破了他们家唯一可破坏的东西——一个鸡蛋。听说朱德也反毛主席，就赶忙把朱德的像片烧掉。总恨自己长得太小，好多活动都不能参加。尤其是看到红卫兵上北京去见毛主席，更是急得不行，相信很多大人也有这种心理。当时邻村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在精神病发作时就说要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反动集团”

大概是六九年吧，批斗对象已不限于四类份子，到处都有“反动集团”，人人自危。谁家都不准也不敢留“外来人口”过夜，哪怕是最亲的亲戚。上午还在批斗别人，下午就可能成为某个“反动集团”的一员而被斗。被斗者被各种刑罚折磨得无法忍受时会“招出”许多“同伙”，其中包括斗人者。不时地听大人们议论一些难以忍受的酷刑。“严禁逼供讯”的指示传达后这种紧张局面有了好转。

餐敬、献忠、破四旧

九大后，每家厅堂的正中都得有个“忠字台”，漆成红色，摆上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及《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曾经还有短期的“餐敬”，每家都有一张红字铅印的餐敬仪式：每餐吃饭前都要歌唱《东方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献忠，就是把家中的金银铜器献出去，谁也不敢不献。因为谁戴过耳环、镯子，用过什么器具别人都知道，如不主动献出而一旦被人揭发，甚至被家人说出去，就是不忠，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献上的东西按当时的价给回了钱，但听大人们说钱有短缺)。破四旧不只是破旧书，破庙堂(我们村的祠堂在文革中被改建)，几乎一切旧的东西都难于幸免。我们家房子上的一切木雕全被铲掉，石砖上的雕刻则由于铲除太费劲而用石灰抹平。

### 几乎成为反革命

文革正在火热当中，每个村口都设有宣传台，台上摆的自然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等，由小学生负责。路人必须读或听一段最高指示后才能经过。当我就在积极地宣传最高指示时，发现路旁丢有一张“忠字像”(五六寸大小的心形硬纸上印着忠字、毛主席像和向日葵，给小孩挂在胸前)，出于忠心，把它捡起来，却不幸被一阵大风吹下了附近的粪缸。马上就有人把消息报告到公社，要不是我的出身好，再加上当时写标语的人作证，“反革命”的帽子非给戴上不可，也就不会有今天。

### 背罪证游行

在文革最热闹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锣声，有时是文艺宣传队的，而大多数是批斗“牛鬼蛇神”的游行。老远就听到“只准敌人老老实实，不准敌人乱说乱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或者“敌人”二字换成具体的名字)、“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声，被斗者戴着高帽、挂着牌子、剪成阴阳头，嘴里喊着“某某是反革命”，“我有罪”，“我该死”等一些自辱的话。印象最深是批斗“富农婆”的游行，其“罪行”是不愿把板凳、洗脚盆和火铲借给贫下中农，于是她就背着这三件东西游斗。几十个村庄游到后来我的脚已经迈不动了。由于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人，我知道的就有三、四个。

### “打倒毛主席”

读初中时印象较深的活动是忆苦思甜，除了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定时讲课外，还经常请苦大仇深的老农民来忆苦思甜，但未尝过忆苦饭。真正使我害怕的是砍柴。因为我的年龄比其他同学至少小两三岁，看着别人半天就完成了任务，而我天黑了却还在路上。第一次听林彪反毛主席的文件传达非常的吃惊(文件是秘密地传达，公开舆论则使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说法)。到后来批林批孔时要写批判文章不知从何下笔，因为压根儿就不知道孔子是谁，更无法和林彪联系起来。高中快毕业时，一位同学说是在厕所里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而被开除，宣布开除他的批判会上，还有一位陪斗的“教唆犯”(教唆的方式好像是问他毕业后的去向)。我虽然从理智上烧了他的照片，但怎么也恨不起他来。几乎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另一班的一位同学，说是写了反动诗。

史无前例的文革已经结束了二十年，似乎已成为历史。然而，那场灵魂深处的运动多少还影响着我们的爱与恨的情感，待人接物的习惯，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着我们对后代的教育。人的天性中恶的方面，应当是文明社会遏制、约束的对象。遥望今日祖国，正义、诚实、善良仍不得弘扬，虚荣、诈骗、嫉恨处处皆是。产生二次文革的土壤并不贫脊。昨天的文革给人们留下的恐惧和今天对不同意见的遏制与文革前的气候并无本质不同，一旦有合适的土壤，第二次文革并非天方夜谭。

□ 寄自美国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 (美 国) | <cnd-cm@cnd.org>      |
| 本期 校对:    | 若 原 (美 国) | <cm-col@cnd.org>      |
| 读者技术咨询:   | 荣 刚 (美 国) | <cnd-help@cnd.org>    |
| 网络技术支持:   | 月 边 (芬 兰) | <cnd-info@cnd.org>    |
| 《华夏文摘》主编: | 萧 同 (美 国) | <cnd-cord@cnd.org>    |
| 《CND》总编:  | 温 冰 (加拿大) | <cnd-manager@cnd.org>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 (GB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 (HZ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 (F T P) : [ftp.cnd.org](ftp://cnd.org)[132.249.229.100]: pub/hxwz

(加拿大读者可用: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hxwz)

考访服务站 (G o p h e r) : [cnd.org](http://cnd.org) (中文或英文目录)

万维网服务站 (W W W) : <http://www.cnd.org/>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本期编辑用软件: XLBR2.0 ©严永欣 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